

# 科举文体文化与文学发展

汪小洋<sup>1</sup> 孔庆茂<sup>2</sup>

1. 江苏广播电视大学 江苏 南京 210036 2. 江苏文艺出版社 江苏 南京 210009

**摘 要** 科举文体发展对文学的发展也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在汉人的写赋的热情、唐人的交往和心理描写、宋人的“以文入诗”中,都可以看到科举文体文化影响的作用。

**关键词** 科举文体文化 汉赋 唐诗 宋诗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4207(2005)04-0038-05

近代以后,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科举文体也被遗弃。但是,千百年来被反复实践的科举文体,在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还是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的。特别是作为文体的写作,它所包含的文学内涵和由此而产生的文化影响,值得认真研究。

## 一、对汉赋发展的促进

从史料看,科举制度的一些重要因素,隋代之前就已经存在。汉代的察举制度与隋唐的科举制度就有着紧密的联系,后者对前者有着一种继承的关系。所以,在我们考察科举文体对文学的贡献时,应当将汉代置于我们的视野。

汉代的代表文体是赋,从汉赋的发展过程看,汉代的选拔制度有着不可忽视的推波助澜作用。汉代选官制度以察举和征辟为主,这两种方法基本上着眼于道德品格和智能才干。在汉代演绎出了许多与文学进步有关的内容。

所谓察举,也称荐举,但要辅以一定的考试才可以最终完成。因此,所选之人都是要在表达上下足功夫的,特别是在皇帝的“策试”中使文章写得富有表现力,这就把所涉及的文体写得都很漂亮,其中产生了许多很有影响的作品。《汉书·晁错传》记:“时贾谊已死,对策者百余人,唯错为高第,繇是迁中大夫。”晁错在策试时写的文章确实好看,其中写到:

诏策曰“通于人事终始”,愚臣窃以为古之三王明之。臣闻三王臣主俱贤,故合谋相

辅,计安天下,莫不本于人情。人情莫不欲寿,三王生而不伤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群莫不欲逸,三王节其力而不尽也。其为法令也,合于人情而后行之;其动众使民也,本于人事然后为之。取人以己,内恕及人。情之所恶,不以强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其天下乐其政,归其德,望之若父母,从之若流水,百姓和亲,国家安宁,各位不失,施及后世。此明于人情终始之功也。

这段策论,层次清晰,语言上口,而且在说理中有一种一层一层汹涌而来的感觉,这与先秦诸子说理的辩论风格有继承的联系,但在与之后的汉赋相联系后就可以发现,汉赋的那种一味图大,为言一事必举数事,天上地下,古人今人,唯恐理说不透、事说不全的表现风格,与晁错的表现有相似之处,都属铺陈的风格。后来的在汉武帝时,被推荐“贤良”的董仲舒;“对策”中连对三策而被列为上等,还有受到武帝亲自策问而获策试第一的公孙弘,他们的策论,无不都是如晁错的策论那样在铺陈中表达观点。这样的社会风气,对汉赋铺张扬厉的风格显然是会产生影响的。比如汉赋大家司马相如,经地方郡守推荐到京城长安学习儒家经典,他在学习中原政治、文化的过程中,前辈们的文章显然对他产生了影响。他学成之后,只在中央朝廷待了很短时间,就辞去武骑常侍,到梁孝王那里专心做赋去了。

收稿日期 2005-05-30

基金项目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项目(J3-041)

作者简介 汪小洋(1958-),男,浙江富阳人,江苏广播电视大学文化艺术系教授,文学博士。

汉代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已经建立并逐步完善,个人的发展前程与中央政府有了更加紧密的联系。在这样的背景下,太学为读书人提供了做官的前程,同样,写文章也能够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赏识,而且还可能是一条发展的捷径。关于这一点,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赋家枚乘和司马相如。

枚乘是景帝和武帝时人,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写有汉大赋的开启作品《七发》。枚乘之前,汉赋的创作实际上还停留在楚辞的余绪上,以抒情为主而少事物的铺写,《七发》改变了这样的状况。《七发》重铺写而少抒情,形成了主客问答的形式和铺张扬厉的风格,完成了汉赋由骚体赋向大赋的过度。枚乘的文章,也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汉书·枚乘传》记:“武帝自为太子闻乘名,及即位,乘年老,乃以安车蒲轮征乘,道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待遇呢?征召是皇帝对官员直接聘任的行为,秦已有之,汉代相沿成例。征召是有规格区别的。最低的一等,被征者需要自己备好马车,而最高的征召待遇,是政府为被征者提供安车蒲轮。征召是由皇帝一人掌握的入仕渠道,数量有限,在汉代被认为是最荣耀显赫的官员选拔途径,枚乘不仅能够列于其中,而且还享受了其中最高的待遇,这当然是赋家的光荣。

再看司马相如,他是将汉赋推向高峰的赋家。《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侍上。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相如被召入京,武帝面前作了《子虚赋》的续篇《上林赋》。自此,汉赋达到了高峰。据《史记》的描写,司马相如“口吃而善著书。常有消渴病”,他能够入仕为官,风光一时,是因为他赋写得好的。

从枚乘、司马相如等赋家的经历看,写赋确实是汉代文人通过选拔的一条途径。这种现象的出现,毫无疑问是对文学发展的促进,它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写赋,可以有更多的赋作品出现。这样的结果,有汉人的文字记载佐证。比如,东汉班固在其《两都赋》的序中说:“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这说明,当时写赋的人很多,而且是各个方面都有,大家在一起还有互相交

流的活动。关于作品的数量,班固《汉书·艺文志》中也有统计:《诗赋略》分赋为四类,即屈原赋类20家,361篇;陆贾赋类21家,274篇;孙卿赋类25家,136篇;杂赋类12篇,233篇。这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次为赋全面分类并做数据统计,是以创作达到一定规模为基础的。

作家多,作品多,写作热情高。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这四大赋家,其作品动辄数千字,天上地下,古人今人,无一不想到,无一不写到,这样大的结构,如果没有巨大的热情,是很难完成的。司马相如就这样回忆自己创作《子虚上林赋》的情景:“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焕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葛洪《西京杂记》)

从本质上讲,科举制度实际上就是皇权的一个外化,科举文体也是皇帝意志的体现。汉代赋文学之所以能够得到极大的发展,是因为汉代有许多喜爱赋文学的皇帝。比如汉武帝,因为他的爱好和提倡,枚乘受到“安车蒲轮”的待遇,司马相如等人的创作将汉赋推向了高峰。关于汉代皇帝的作用,明代胡应麟《诗薮》就有一段可以说明问题的描写:“唐诗千余人。宗室与列者不能屈全指。先秦、汉赋六十余家,而刘氏占籍者十数人,东汉不与焉。是唐宗室能诗者,不过百之一,而汉宗室能赋者,几得十之三,何其盛也!虽湮没不传,名存史籍,亦厚遇矣。”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由于皇帝的意志,赋写得好,可以入仕,可以被征召,这样就使得现实社会中赋与选拔人才有了紧密的联系。反过来,写赋的人数大量增加,热情提高,推动了赋文学的发展。如果我们把汉代这样的士子选拔看作为一种文体选拔,那么,从这样的过程中,可以发现文体选拔文化对文学发展产生影响的痕迹。

## 二、对唐诗繁荣的促进

唐代科举考试科目繁多,其中士子们最看重的是进士科。唐初,进士科只考时务策五道,内容是考对当世要事的对策。后来考试增加了经帖和杂文,唐中叶后开始增加诗赋的考试,而且诗赋的成绩受到重视,如果经帖考不及格但诗赋考的好,最后很可能还是会被录取的。

唐代制科原先也只是考当世要事的对策,即“时务策”,但唐玄宗以后增加了诗赋的内容,称

贴诗,即在经义策问的基础上加试一诗一赋。这样,在唐代科举考试的文体中,常科和制科都有了诗赋的内容了。

从科举文体文化看,诗赋进入考试文体是对士子评判标准的一个新认识。当时认为,很多考生对经义和旧策掌握得不错,但是靠死记硬背的,缺少真才实学,因此,应当在经帖考之外再增加一些标准,于是选择了诗赋。诗赋是一种综合的创作文体,可以较好地检验士子的才学。

当诗歌成为科举文体之后,士子对诗歌的看法和热情又有了新的内容。从形式逻辑的角度看,诗歌丰富了科举文体,而从辩证逻辑角度看,科举文体的诗歌对文学也是一个促进,它承认诗歌对士子才学的反映,同时,也以科举制度特有的文化性质影响着诗歌的存在,比如诗歌创作的功利性,比如对心理描写的注意等。

诗言志,这是古人作诗的志趣。什么志?诗人笔下更多的还是个人的心情,特别是盛唐气象,不论是李白这样的豪放诗人,还是边塞诗、山水田园诗这样的诗歌流派,其创作都是以个人的心情抒发为主。但是当诗歌列入科举文体后,情况就有了一定的变化。中唐诗人韦应物,出身于名满长安的世族,他的一首诗就透露出了这样的信息。他在《逢杨开府》中写到:“少事武皇帝,无赖恃恩私。身作里中横,家藏亡命徒。”这样的纨绔子弟进了太学,但终日荒唐放纵,结果是“武皇升仙后,憔悴被人欺”。怎样改变这样落魄的境况呢?他写到:“读书事已晚,把笔学提诗。”在爱好诗歌的古人那里,学诗与读书往往是一个概念,这里诗人将两者并提,也许是互文的修辞,但结合科举考试科目中已经有了贴诗一科的情况,我们还是可以思考学诗与科举考试之间的紧密联系的。

和诗是古代文人喜爱的活动,中唐以后,这样的活动也常常与科举联系在一起。比如一代大家韩愈,他在仕途上提携和汲引士子的故事是大家乐道的事情,这其中许多都与诗有关,像孟郊、张籍、贾岛、李贺等,皆是因诗而友的。唐代张固《幽闲鼓吹》里记有韩愈与李贺相识的一段故事:“李贺以诗歌谒韩吏部,吏部时为国子博士分司,送客归,极困。门人呈卷,解带旋读之。首篇《雁们太守行》曰:‘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即缓带,命邀之。”李贺的诗得到韩愈的赏识和延誉,韩愈后来还作《讳辩》为李贺辩护。

再看中唐孟郊。孟郊也是韩愈的诗友,因风格相近而有“韩孟”之称,但他写诗从文体上看有自己的特点,就是专攻诗歌而又专写乐府古诗,不写律诗。唐代的贴诗体裁是格律诗,孟郊诗名很大而屡屡不中,其中是不是有他不写律诗方面的原因不得而知,但跟他学诗的人确实不多。晚唐张为《诗人主客图》归纳了六种诗歌风格类型,每一种类型都有“主”、“上入室”、“入室”、“升堂”、“及门”的排列。关于孟郊诗派的排列是:清奇僻苦主孟郊;上入室陈陶、周朴;及门刘得仁、李溟。广大教化主的白居易,其派中有18人,高古典逸主孟浩然也有13人。相对而言,孟郊派的诗人是太少了,且其中也缺少名家。结合贴诗的体裁,科举文体的选用应是一个原因。故在科举文体文化中,其功利性对唐诗的创作价值是有影响的。

科举文体文化的影响,还表现在唐诗在心理描写上的变化。盛唐以前,诗人在心理描写上并不深入,这种情况到盛唐后有了改变,在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这样的长篇中可以见到细腻的心理描写,在元稹《行宫》这样的小诗中,也可以看到让人为之感叹的心理描写。元稹《行宫》这样描写:“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四句二十字,垂老宫女的“闲坐”而“说”的心理活动已经让读者回味无穷了。瞿佑《归田诗话》如此评价:“乐天《长恨歌》,凡一百二十字,读者不厌其长;元稹之《行宫》诗,才四句,读者不觉其短;文章之妙也。”此“妙”,就是因心理描写而产生的艺术效果。

为何在中唐以后诗人注意心理描写了呢?这与科举文体有一定关系。唐玄宗以后,科举考试增加了诗赋的科目。在唐代,因为考试的试卷一般都不糊名密封,取录进士时除了看试卷之外还可以参考考生以往的创作情况和社会影响,所以,士子有考前带着自己作品拜访考官等相关名人的风气。考生向参与取录的名人呈献作品以争取他们的“拂拭吹嘘”,这叫“投卷”,如果是向礼部呈献作品则称之为“公卷”,向达官贵人呈献作品就称之为“行卷”。为了能够得到考官的注意,士子们不仅要写诗写得好看,还要细心琢磨考官的欣赏爱好而投其所好,以引起注意,以获得最好的效果。这样,士子们在热心写诗的同时,又增加了揣摩对象心理、注意心理描写的写作内容,反映在诗歌创作中就有了普遍关心心理描写的现象和这样

的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朱庆余应举前写的《近试呈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当时的考官张籍是诗坛酬唱广泛的诗人，他对后进青年每能热情奖掖、真诚吸引，朱庆余将自己那种自信而又自负的心理写入诗中呈现给他，得到的效果可想而知。张籍大为赞赏之下也写了一首《酬朱庆余》：“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故沉吟。齐纨未是人间贵，一曲菱歌敌万金。”这样的千古佳谈，反映出唐诗在心理描写上的进步。当然，这与科举文体的文化背景是有联系的。

科举考试是涉及所有士子的制度，所以，其文体改变不重心理描写的作用不能低估，我们可以从中唐以后许多诗人的作品中看到这样的痕迹。李益是中唐的边塞名家，他的许多名篇就是以抓住边疆将士的心理瞬间而著名。如《从军北征》：“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遍吹《行路难》。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再如《夜上受降城闻笛》：“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心理描写的进步，对唐诗发展来说是一个促进的因素。

### 三、对宋人“以文入诗”的影响

中国文学史上，对宋诗的认识是存在着很大分歧的。虽然也有不少人肯定宋诗，但更多的是扬唐抑宋。清代朱彝尊甚至说：“今之诗家，不事博览，专以宋杨、陆为诗，庸俗之语，令人作恶。”（《汪司城诗序》）人们不喜宋诗的原因，一种普遍的说法是宋人“以文入诗”。宋人为何“以文入诗”呢？这与宋代的特殊文化背景有关，而且笔者认为，宋代的科举文化也起着一定的作用。

宋代的学术思想与前代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被后人专称为“宋学”。简言之，在中国学术史上，宋之前以汉学为主流，讲究章句训诂，而宋人则以探讨性命义理为方向。宋人为积弱王朝不得不进行积极的思考，自觉地总结、探讨和推行加强中央政权的政策。这样的要求反映在学术界，儒学一改汉唐以来的沉默局面，而以活跃的思辨义理积极为现实政治服务，从而形成了所谓的“道学”或“理学”的新儒家思想。

好议论的宋人风气，直接反映到了宋代的科举考试中，从宋代科举制度演变的三个过程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宋代科举制度的第一个过程是

神宗改制前，进士科仍然以诗赋取士为主。第二个过程是神宗改制至北宋末，神宗采纳了王安石的建议，废除经学诸科，将其归于进士，但后者罢试了诗赋，改考经义、策论这样偏重实用的科目。后来诗赋虽曾恢复过，但难复原有地位，绍圣初诗赋再罢，直至北宋灭亡。第三个过程是南宋时期，这一过程基本上是沿用元佑四年的制度，诗赋与经义分科，在强调义理的文化背景下，诗赋在科举考试中的地位显然是降低了。

在宋代科举制度的改革中，王安石的作用最为显著。熙宁四年，王安石出考试新法，规定废除明经科，专以进士科取人，而进士考试废除诗赋、帖经、墨义，突出经义和策论考试。他曾多次做诗批评以诗词工巧取士的做法：“童子常夸作赋工，暮年涩悔有扬雄。当时赐帛倡优等，今日论才将相中。细甚客卿因笔墨，卑于《尔雅》注鱼虫。汉家故事真当改，新咏知君胜弱翁。”（《详定试卷》）又如：“少时操笔坐中庭，子墨文章颇自轻。圣世选才终用赋，白头来此试诸生。”（《试院五绝》）

宋代是一个极其重视教育的朝代，不论是官办的学校还是民间私人办的学校，数量上、规模上都是空前的。北宋曾有庆历、熙宁、崇宁三次大规模的兴学。《宋史·选举志》记载：“自仁宗命郡县建学，而熙宁以来，其法浸备，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治彬彬矣。”南宋学校之盛，耐得翁《都城纪胜·三教外地》有这样的记载：“都城内外，自有文武两学，宗学、京学、县学之外，其余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有这样庞大的教育体系，几乎是将所有读书人尽收其中。

宋代的科举录取人数也是前代所不能比的，唐代每年各科考试录取的人数一般不超过50人，经常是只有一二十人，而宋代一般少则录取二三百人，多则达到五六百人。比如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取进士190人，诸科207人，十五举以上“特奏名”184人，几项相加竟达500多人。有这么多人被录取，而且是经过“子墨文章颇自轻”的学校教育，所以，宋代的学校教育影响是巨大的。

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下，宋代士子在“右文”政策吸引下积极参与现实政治生活的热情高涨，在政治上以天下为己任，在学术思想方面表现出了大胆的怀疑和创造精神。陆游曾经说：“唐及国

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王应麟《困学记闻》)这种想法前人想也不敢想的,而宋人这样做了,还得到了科举考试的支持。

宋代科举考试不重诗赋,但宋人学诗的人数却是不弱前人的,学诗论文是各社会阶层的广泛爱好。吴可《藏海诗话》记载:“元佑间,荣天和先生客居金陵,僦居清化市,为学官,质库王四十郎、酒肆王念四郎、货角梳陈二叔,皆在席下,余人不复能记。诸公多为平仄之学,似乎北方诗社。”文学史上常说的“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说的就是宋代的诗歌普及程度。陆游一生写了9000多首诗词,杨万里一生写有4200多首,这些也可以说明宋人写诗的热情。

对实用之文与诗歌之间关系的认识,宋人也有一个过程。欧阳修主张道以充文:“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欧阳文忠集》)王安石更是强调文学的实用性:“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临川集》)不过,后来像理学家程颐提出“文以害道”的则是少数,更多的人还是将两者相融合,要求文道统一。当然,在次序上是有先后的。秦观是这样说的:“文以说理为上,序事次之。”(《淮海集》)

以上即是“以文入诗”的文化背景,科举制度在考试文体上的重实用而轻诗赋的做法,也可以说是为宋人喜于在诗中发表议论提供了强大支持。宋王朝在科举考试上实行的是高取录政策,宋代的著名诗人几乎都走了科举之路。在搏功名的过程中,受到科举文体的影响当是正常的。苏

轼是宋代最富创新的诗人,他22岁与弟苏辙中同榜进士,一时名噪京师。他是宋代科举制的幸运者,他也是强调诗文实用的最力者之一。他要求诗文“有意于济世之用”而反对“多空文而少实用”,在创作中他也是这样做的,他的诗词充满着对现实的思考。他一生累于党争,在《水调歌头》中就有了“高处不胜寒”辩证看法,有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的豁达思考,有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美好期望。晚年有诗句“常恨此生非我有”,真是把一生的痛苦都想通了。“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题西林壁》)更是脍炙人口、妇孺皆晓的理趣诗了。苏轼诗词的成就,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是缘于他的思考和表达。他在科举考试中的成绩,可以和诗词对读。其他许多著名的诗人,在我们读到那些富于思考的诗句时,往往都可以发现他们在科举考试中有过出色的表现。

通过以上的梳理,我们可以这样描述宋代科举文体文化对宋代“以文入诗”的影响:宋代的积弱王朝现实,使宋人不得不进行积极的思考,这一点反映在宋代科举考试上,其内容与唐代就有不同的要求,它更加强调实用。由于繁荣的宋代教育与科举有着密切联系和宋代科举空前的录取人数,使得议论之风深入人心。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宋诗有了与唐诗不同的面貌,即“以文入诗”。

参考文献:

- [1] 汪小洋,孔庆茂. 科举文体研究[M].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 [2] 尹占华. 律赋论稿[M]. 成都:巴蜀书社,2001.

## The Influence of the Writing Style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on Chinese Literary Progress

WANG Xiao-yang<sup>1</sup>, KONG Qing-mao<sup>2</sup>

(1. Jiangsu Radio & TV University, Nanjing 210036, Jiangsu, China;

2.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Nanjing 210009, Jiangsu, China)

**Abstract** The writing style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urse of Chinese literary progress. Its influences is obvious on the Fu-writing in the Han Dynasty, the personal relation and psychological depiction in the Poems of the Tang Dynasty, the prose style in the poems of the Song Dynasty, etc.

**Key Word** the writing style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Fu-writing in Han Dynasty; Poems of the Tang Dynasty; poems of the Song Dynasty

(责任编辑 亦文)